

中国文学新论

徐传武 主编

明代诗文综论

王承丹 著



中国文
学新论

明代诗文综论

王承丹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代诗文综论/王承丹著 .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1999
ISBN 7—5059—2644—6
I . 明… II . 王… III . 文学理论—作品集—中国 IV . 10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8295 号

书名	明代诗文综论
作者	王承丹
出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王军
责任印制	胡元义
印刷	山东农业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7.4 万字
印张	6.69
印数	0001—1010 册
版次	1999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5059—2644—6/I·1766
定价	13.80 元(全套 218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PDG

序

裴世俊

中国的古代文学，以诗歌而论，唐代是集大成时期，成就最高，宋代继唐之后又有一次大的发展。散文的发展大致也是如此。到了明清两代，文学的主流转入戏曲、小说，且成就斐然，但值得注意的是，诗文仍然是或者主要是知识阶层表达思想感情的载体，也是推动文学思潮变化发展的动力。相对于唐、宋和清代诗文的繁荣兴盛而言，明代似乎难以匹敌，但作为一代文学，它自有其特殊的地位和影响，不能轻易抹杀。然而自进入本世纪，随着一些著名人物做出的诸如“好诗被唐人做尽”、“诗的发展到北宋实际上也就完了”等论断，明清两代诗文遭到冷落，而后者更因为是“五四”运动最近、最直接的靶标，几乎被全盘否定，沦落于学术视野的边缘。即使在建国以后，明清诗文的研究也根本无法与小说、戏曲相比，不只是冷寂，简直可以说是一片荒芜。到了八十年代，这种局面才稍有好转，这是不争的事实，为大家所公认。

即以明代而论，在正宗诗文领域，最引人注目的是以复古为口号的文学思潮。前后七子发起的复古运动，旨在冲破台阁体的束缚，恢复秦汉散文盛唐诗歌的优秀传统，给主体感情以一定的地位和价值。它倡导学习民歌，注重文学创作的真情实感，是明中叶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新变化在文学领域的反映，也是明前期高压统治解冻的结果。复古运动打破了当时文坛以至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沉寂局面，开启了明后期个性文学思潮和进步思想的先河，是明代文学思潮和思想演变的必要过渡。到了明中叶，随着资本主义萌芽

的出现和市民力量的崛起,陆、王心学风行一时,它注重“良知”,直指本心,强调内在精神本体,和禅宗的“万法同心”同出一辙。后来的泰州学派代表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把心学又引向了民主主义和启蒙主义。这样,心学、禅宗和市民思想的结合,促成了叛逆和异端思想的蓬勃发展,也使小说、戏曲和诗文等文学样式,适应市民的欣赏要求,带着强烈的通俗性走向了千家万户。以个性解放为标志的晚明文学思潮风靡天下,它宣扬以情反理、抨击虚伪的假道学,大胆肯定人的情欲的合理性。在这种情况下,复古派显得黯然失色,被晚明文学抛弃和超越,走向衰落,但它是明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里的重要一翼。也就是说,复古派力图恢复古典审美传统部分得以实现,到逐步解体、蜕变,以及晚明个性思想的酝酿和勃兴,如狂飙涌起,掀起一股摧枯拉朽的浪潮,又遽而消歇,是明代文学思潮的基本面貌和演变的轨迹。

从上可以看出,整个明代,特别是明代晚期,以其张扬个性,崇尚自由和异端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占有突出的地位。追本溯源,它从阳明心学开始,经过徐渭、李贽、汤显祖、公安三袁的倡导实践,不仅使人们在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审美情趣等上发生了变化,形成当时时代精神的主流,也使社会上洋溢着一种倡导个性的叛逆精神,开始用批判的思想去对待传统、人生和自我,兴起了复苏人性和肯定人欲的社会潮流,有力地冲击了封建礼教和旧有的秩序,使明代文学呈现出新的气象。重“情”,尚“真”,强调诗的情感特征和个性表现,重视审美情趣的反映和抒发,艺术特色上追求自然本色和豪气淋漓,反对复古派的“假诗文”等,成了明代后期审美趋向的主要特色,进而表现于诗文、戏曲、小说、绘画、书法等各种领域,对后世产生了甚为深远的影响,以致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些作家,也承认其与晚明文学有一定的血缘关系。

因此,明代文学包括它的诗文在内,不仅是中国文学史发展链

条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而且是古典文学走向现代的转折,尤其是晚明,它是从古典走向现代的发端,迄今仍在发生作用,其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王承丹博士出版的学术专著《明清诗文综论》,以其理论的敏锐性和较为扎实的学术动力,把明代中叶前七子到晚明小品文作家张岱为止的这一段文学,作为自己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既抓住了“牛鼻子”亦即重点问题,又触及到当前研究的热点和前沿。就其呈现于读者面前的这部学术专著来看,他对明代诗文一些文学现象所作的系统考察和理论阐释,令人耳目一新,对某些问题的潜心探究和条分缕析,例如《汤显祖与公安派作家》、《钱谦益与公安派》、《公安派与竟陵派》、《虽好之,不学之——公安三袁对李贽的矛盾态度》等,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锄犁初及的拓荒开垦,取得了较为可喜的成绩。付出的艰苦劳动有了实实在在的回报,这是极为值得,也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这部学术著作的着力之点,是投注心力于具体问题或者说个案的研究,小题大作,但视野宏通,尽量依照文学的本来面目给予历史的还原性考察,每一篇解决问题不多,却很明确,又用了狮子搏兔的力气,因此论点集中深入。而在微观上,则做到追踪蹑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逐一考察,剖解各种关系和复杂的内容,使论据和材料极为充实,这就避免了某些论者浮光掠影、大而化之的通病。例如对明代前后七子的研究,众所周知,在中国文学史上,明确以复古为口号的运动有四次,即唐初陈子昂高倡汉魏风骨,中唐韩、柳领导的古文运动,北宋梅、欧等倡导的文学革新和明代长达百年的文学复古运动。前后七子崛起,一浪接过一浪,前潮未平,后波又起,高峰时几乎席卷整个文坛,与前三次相比,历时之久,规模之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甚至蔚成一代风气,成了明代近三百年诗歌发展的主流。对这样一个流派,本书不仅以《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为题,探讨了种种原因,而且还把问题的重点放在衰变上,连用四篇文章《前七子的论战》、《前七子衰微的内部原

因》、《后七子的内部纷争及其影响》、《王世贞诗文理论的矛盾性》，给予新的探索。作者以足够的篇幅与份量，在纵向与横向的比较上，从外部社会历史与内部纷争，自身演变等角度上，予以多方位的考察与分析，指出李梦阳、王世贞以及整个复古派诗文理论体系的矛盾，实质上是“格调”与“性情”、“神韵”的对立。这种矛盾几乎贯穿于复古运动的全过程，是复古思潮走向衰微的内部原因的动力所在。这样的结论，抉发深邃，审慎可信。同时，作者在论述时重点突出，以七子派领袖人物为发矢之箭的，剖析入微，又兼顾了整个派别，全面周到。这种阐释和解读，给我们揭示了七子派成员及其理论的复杂性和混合性，可以说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远不是仅以“复古”二字所能涵盖的。其他的论述，如对公安三袁昆仲性格的概括：袁宗道城府深厚，息机敛锷，袁宏道飞扬恣肆、锋芒毕露，袁中道落拓不羁，悲苦忧愁，再与其他因素相结合，导致他们对师长李贽的态度各有不同。而作为思想家的李贽，固然对假道学进行鞭斥挞伐时，“丰骨棱棱，舍身忘我，大智大勇”，有毫不留情的一面，但有时也感情激荡，欲吐满腹的辛酸，甚至不可遏止，展示出血肉之躯的丰富内心世界，等等。这些笔墨所过之处，都显示了较为独到的见解和别有会心的感悟，是人所不言或忽略的，他却娓娓道来，如溪流潺潺，既令人称赏，也有着启迪与教育的作用。

承丹还很年轻，又很刻苦，在繁忙的教学之余，手不释卷，奋笔耕耘，数年以来，所获良多，照此努力，将来肯定大有希望。当然他今后的学术道路还很长，尤其是研究明清诗文，文献资料极多而又复杂，可资借鉴的又极少，困难很多，但既然选择这个专业方向，就企盼他“板凳要做十年功”，沉下心来，沙里淘金，多出精品，既嘉惠士林，也为明代诗文这个较为薄弱的领域，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出于这种目的，欣然为其作序。

2000年4月12日于山东师范大学

目 录

序 裴世俊

诗文复古论

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	3
前七子的论战	10
前七子衰微的内部原因	18
后七子的内部纷争及其影响	32
王世贞诗文理论的矛盾性	43

诗文革新论

徐渭的人格精神与文学理论	53
葆“童心”创“至文”——李贽的文艺观	70
汤显祖与公安派作家	89
袁宗道的文艺观.....	109
袁宏道前期的诗文理论.....	119
“虽好之,不学之”——公安三袁对李贽的矛盾态度	137
公安派与竟陵派.....	148
晚明作家对张岱的影响.....	165

附 论

孔子·是非·假道学.....	181
钱谦益与公安派.....	195
后记.....	207

诗文复古论

老
PBG

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

诗文复古运动在明代中期兴起,展示出后期古典文学发展的特征,许多问题值得深入探讨,其兴起作为一种历史的必然,亦有诸多与之关联的社会背景和文学本身的内在因素。

中国的封建体制发展到明代渐趋没落,统治者力图拯救,以期重现汉、唐的盛世风貌。明太祖朱元璋在明朝未创之前就明确提出“复汉室之威仪”^①的口号。明朝建立伊始,太祖又下诏曰:“诏复衣冠如唐制。”^②在这种情况下,明代用以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了唐、宋旧制,但加以改进以八股取士,并使之日臻完善,“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③。作为名缰利索,八股文严重束缚、钳制了人们的思想,而为了加官进爵,图得功名利禄,士子们又不得不沉溺其中。诚如明末诗文作家艾南英所言:“非是途也,虽孔孟无由而进。”^④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亦曾直陈八股之弊:“时文之书,每科一变,五尺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而钝者至白首不得遇。老成之士即以有用之岁月消磨于场屋之中,而少年捷得之者,又易视天下国家之事,以为人生之所以

① 《皇明文衡·谕中原檄》

② 《明实录》

③ 《明史·选举制》

④ 《天佣子集》卷二

为功名者，惟此而已。故败坏天下之人才，而至于士不成士，官不成官，兵不成兵，将不成将。”^①他还说：“今之经义策论，其名虽正，而最便于空疏不学之人……此法不变，则人才日至于消耗，学术日至于荒陋，而五帝三王以来之天下将不知其所终矣！”^②清人吴乔也说：“事之关系功名富贵者人肯用心。唐世功名富贵在诗，故唐世人用心而有变；一不自做，蹈袭前人，便为士林中滞货也。明代功名富贵在时文，全段精神，俱在时文用尽，诗其暮气为之耳。”^③八股取士使士子们埋头于四书、五经中，再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去写诗作文，经世致用。因此，诗文复古运动的成员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④，无疑具有一种拨乱反正的作用，亦即宗臣所谓：“千载榛芜，李、何再辟，俾海内学士大夫重睹古昔。”

明初太祖、成祖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在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政策，但稍后的几代帝王、王室成员都有身体力行倡导诗文之举，他们的作品为人们所接受、喜爱，甚至出现了“齐唱宪王（朱有燉）新乐府”的局面。“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⑤这对复古运动的兴起亦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中国古典诗歌在唐代所取得的空前繁荣对后代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宋代诗歌。这是因为，唐诗在思想内容、题材、体裁、创作方法、艺术技巧等方面，给宋诗提供了榜样和范例。但是，更应看到不利的一面，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到唐代，一切好诗都已经做完。亦如蒋心余所说：“宋人生唐后，开辟真难

① 《亭林文集·生员论》

② 《日知录·经义策论》

③ 《答万季野诗问》

④ 《明史·文苑传》

⑤ 《文心雕龙·时序》

为。”^①但宋代诗人却能走出唐人的阴影，学唐而又不为唐所规范，他们“承唐之后，而能不袭唐贤衣冠面目，别辟门户，别树壁垒。苏子瞻以新，黄鲁直以奇，使宋诗臻于极盛。”使得宋诗能与唐诗并驾比肩。对此，当代学者缪钺先生亦有精辟的论述：“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②但是，与唐诗相较，宋诗又确有不足之处：“唐人诗纯，宋人诗驳；唐人诗活，宋人诗滞；唐诗自在，宋诗费力；唐诗浑成，宋诗订桓；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躁；唐诗铿锵，宋诗散缓。唐人诗如贵芥公子，举止风流；宋人诗如三家村乍富人，盛服揖人，辞容卑俗。”^③南宋严羽更值得注意，他不怕“得罪于世”，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宋诗的两大巨擘苏轼和黄庭坚：“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读之反复终篇，不知着到何处。其末流甚者，叫噪怒张，殊乖忠厚之风，殆以骂詈为诗。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④严氏反对苏、黄作诗违背“吟咏情性”，并在总结“唐诗之道”的基础上，倡言“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严羽而后，金人王若虚认为“诗道至宋人已自衰弊”^⑤。元好问亦说：“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⑥在这种返汉复唐风气渐炽的情况下，明代诗文复古运动迅速兴起自然已属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① 《忠雅堂诗集》

^② 《诗词散论·论宋诗》

^③ 《霏雪录》

^④ 《沧浪诗话》

^⑤ 《滹南诗话》

^⑥ 《论诗绝句三十首》

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也是纠正明初文坛不正之风的需要,这主要是针对“台阁体”和“性理诗”。

严羽提出“以汉、魏、晋、盛唐为诗”之后,诗人们多走上了师法唐诗的道路。元末明初,杨维桢及其门人贝琼,论诗主唐音。此时的高启尤其引人注目,他“拟汉魏似汉魏,拟六朝似六朝,拟唐似唐,拟宋似宋,振元末纤秾缛丽之习,而返之于古,启实为有力……”^①在复古模拟方面,高启有开启之功。明初的文坛(特别是诗歌),“熬过了蒙元统治的漫漫长夜”后,“出现了一片春光明媚的景象”^②。前人对此亦有论述:“凡论明诗,莫不谓胜于弘正,极于嘉隆,衰于公安、竟陵。余谓莫盛于明初。若犁眉、海叟、子高、翠屏、朝宗、一山、吴四杰、粤五子、闽十子、会稽二肃、崇安二蓝,以及草阁、南村、子英、子宜、虚句、子宪之流……且明初诗家,各抒心得,隽旨名篇,自在流出,无前后七子相矜相轧之习,温柔敦厚,诗教固如是也。”^③但是,这种繁荣景象只是昙花一现,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由于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文化高压政策,诗坛、文坛一片萧杀。

到成化、弘治时,荒芜的诗苑又出现了另外的局面:“诗道傍落、杂而多端,台阁诸公,白草黄茅,纷芜靡蔓……理学诸公,击壤打油,筋斗样子。”^④台阁诸公的“台阁体”和理学家们的“性理诗”汇成两股逆流,一时充斥诗坛,这两类诗要么苍白无力,要么枯躁乏味,内容空洞平泛,形式呆板单一,无甚大艺术价值可言,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洪武稍后的诗坛的空白。永乐、宣德以后,社会上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出现了相对升平景象,备受封建统治者礼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② 黄瑞云《明诗选注·前言》

③ 陈田《明诗纪事》

④ 《静志居诗话》

遇、高居馆阁的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诸人自然要为这种承平局面大唱颂诗赞歌。因此从这一点来说,台阁体的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盖其文虽乏新裁,不失古格,前辈典型,遂主持数十年之风气,非偶然也”^①。台阁体文人的作品大多平正典雅、雍容和易,作为那个时代的产物,原本无可厚非,但“秉国既久,晚进者递相模拟,城中高髻,四方一尺,余波所及,渐流为肤廓冗长,千篇一律”^②。更有甚者,“成化以还,安享太平,多台阁雍容之作,愈久愈弊,陈陈相因,遂至啴缓冗沓,千篇一律”。以至于“成弘之际,趣不及古,中道便止,搜不及深,遇境随就,一唯拙出,和章累押,无患才多”^③。而明代的“理学五贤”(吴与弼、薛瑄、陈献章、罗伦、庄昶)的诗歌“作品”虽与“台阁体”“大异其趣”,但“其所制作,一本诸性理,藉以讲学论道,俾可养心修身”^④。而“入主出奴”之诗风,“未免昧于诗教之本旨”,“去张打油、胡钉铰无几矣”^⑤。二害并行,最终导致了“诗道傍落,唐人风致几于尽露”。

茶陵派领袖李东阳及其羽翼,力图扭转文坛的混乱局面,他们特别不满于有“太平宰相之风度”、“富贵福泽之气”的台阁体文风。因此,李东阳“出入宋元,溯流唐代,擅声馆阁”^⑥,率先起而排击,大力振救,最终取台阁体而代之,操天下文柄数十年。然而茶陵派文人的诗文多“演绎有余,覃研不足”^⑦,对台阁体积弊的清理收效甚微。实际上,李东阳本人也是个“历官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的台阁中人,他不能廓清流弊,导诗文于正轨,个中原因可想而知。

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②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③ 《艺苑卮言》

④ 李曰刚《中国诗歌流变史》

⑤ 《静志居诗话》

⑥ 《明史·文苑传》

⑦ 胡应麟《诗薮》

但是,就象陈涉开启汉高祖一样,李东阳奖掖推挽,“兴起何、李”,李梦阳、何景明登高一呼,应者云集,以他们为首的前七子诗文复古集团迅速崛起于文坛,不但成了荡涤“台阁体”、“性理诗”颓波浊流的生力军,同时也正式拉开了诗文复古运动的序幕。

明代诗文复古运动的兴起有一段较长的酝酿期。诗歌崇尚盛唐,这在唐代的殷璠那里已初露其端,他认为:“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①此后的司空表圣也提出类似观点:“沈、宋始兴之后,杰出于江宁,宏肆于李、杜极矣。右丞、苏州趣味澄琼,若清风之出岫。”^②有了这方面的基础和准备,严羽的理论随之诞生。严氏明确提出自己的观点,他说:“以汉、魏、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③这种主张又直接影响金、元二代。至明初,以林鸿为首的“闽中诗派”倡导学习盛唐,首开明代遵唐学唐之风气,所以李东阳说“林子羽《鸣盛集》专学唐”^④。“闽中十子”之一的高棅承严羽接林鸿,力主唐音,其作《唐诗品汇》“辨尽诸家,剖析毫芒”,影响有明一代。所有这些,都是“李、何崛起中州”所不可或缺的准备步骤。

明代盛行结社之风,^⑤也有利于复古运动的成员们集聚到一起。“士必有所聚,穷者聚于学,达者聚于朝,及其退也,又聚于社”^⑥。文人学士聚而为文社,如同政治上持见相同者结为朋党一样,是极其自然的事情。诗文复古运动开始的标志是前七子结社的完成,其中兴又始于后七子的结社,这都说明结社风气有利于诗

① 《河岳英灵集自序》

② 《与王驾评诗书》

③ 《沧浪诗话》

④ 《怀麓堂诗话》

⑤ 见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明代的文人集团》

⑥ 方九叙《西湖八社诗帖序》